云也退

2020.12.06

酒馆来客

云也退
作家酒馆

第9位：莫利亚克，亲情的绑架可以被斩断吗？

第9位：莫利亚克，亲情的绑架可以被斩断吗？

00:00 28:22

今天我们的酒馆迎来了客人，他是一个富家子弟，但他要和我们聊一聊，他儿时最大的恐惧是什么。他要讲一讲，他是怎样被家庭亲情的纽带，被那些变态的爱所折磨的。

他带我们来到他十五岁时所住的屋子，屋外有一条小河潺潺地流过，当我们听到水声清晰起来，就知道是夜晚到了。

他让我们像他一样，躺在一个虽然宽敞但是阴暗的房间里，即使闭上眼睛，也能看到一大片松树林，足足有三千公顷，这里面藏着猎人抓不完的野兔，有成群的牛羊，和放牧它们的佃户，有伐木和取松脂的工人，还有机器人一样的管家，有各种惟命是从的男女佣人和他们的孩子。

这个男孩，他躺着，默不做声。他听见敲门声响起，听见有人在低声呼唤他。可他不想去开门。他假装睡着了。我们在青春期都会有这样的装睡时刻。我们的耳朵，把父母亲抱怨一丝一缕吸收了进来：这孩子，谁知道他在真睡还是装睡；这孩子越来越倔了，不听大人话了。我们会在心里发笑，但又有些烦恼，有些犹豫，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发笑，不知道怎样对付这种牢骚，更不知道日后，自己和父母之间还会发生一些什么。

但或许，我们依然想要回到那个年龄。就像我们这位作家一样，这位躺在大宅中的少年，到八十多岁，成为德高望重的文坛名宿的时候，依然是那个躺在阴暗房间里的少年，依然是一个爱的荒漠中孤独的呼告者。

他就是Francois Mauriac。法国作家弗朗索瓦·莫里亚克。

弗朗索瓦·莫里亚克（法语：François Mauriac，1885年10月11日 - 1970年9月1日），法国小说家，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。

莫里亚克在法国波尔多出生，1905年在波尔多大学文学系毕业。他的主要作品有诗集《握手》、小说《爱的荒漠》等。

他在小说里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描写那片松树林，那是他家的产业。他是一个法国外省的大地主的后代，那片地区的首府是波尔多。他可以在松树林里任意行走，在外边的荒地和草场上，农民放牧牛羊，看到少爷来了，就会用手在贝雷帽上戳一下，敬个礼。

这里的大松树吸引着游客，在树下，蕨草长得跟弗朗索瓦一样高了，他总是跳进草丛中，用拳头打那个草，那草总是反弹回来，他又一头扑进去，呼吸那种腥气的草根的味道，觉得是自己中了毒，在流血。

我们看到，这位大少爷好像在寻求发泄，总在跟周围和自身的一些东西搏斗。

这搏斗非常困难。他感到那草木在包围他，淹没他；他是这么大产业的继承人，可他一点都不开心。他的妈妈总在向孩子们灌输这样的观念：这片地方，是我们家经过三代人的努力才拥有的，将来也会归你们所有；但弗朗索瓦，他说，我喜欢大自然里的草木，可我不喜欢占有它们的感觉。

松树有很多的经济价值。比如外省的那些矿山，开挖出来的坑道需要用松树树枝来做撑木，把坑道撑起来；比如松脂可以用来照明；比如铁路铺枕木，也要出钱才能来砍伐。但是弗朗索瓦却觉得这一切应该结束了。他看到电线铺到乡下来，就希望电灯可以尽快普及；他希望矿坑能有别的方法来加固，不再依赖松树。

他说，那些老百姓尊敬我，并不是因为我热爱这片土地，而是因为我是这个土地的继承人。我找不到和我一样，能被大自然本身所打动的人。所以我只想一个人呆着。我宁愿呆呆地站在那里，一言不发，看草场慢慢被露水湿润，听溪水声轻轻的，连续不断。

可是一个人在哪里被抚养长大，他就无法摆脱那里的一切了。他无法选择出生在怎样一个家庭，更无法选择自己的母亲，哪怕他害怕母亲，甚至恨她。就让他来告诉我们，他有怎样的一个母亲。

我们知道，法国一直是一个天主教国家。虽然1789年，法国大革命打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，扫荡了宗教势力，可是直到一百年以后，像波尔多所在的这种外省乡村，仍然属于天主教的势力范围。

弗朗索瓦的母亲，作为一个大乡绅，跟乡间的天主教神父之间关系十分紧密，天主教堂靠乡绅来供养，而乡绅对他们的子女也是执行最严格的天主教教育。

弗朗索瓦在家里岁数最小，母亲最宠爱他，但约束也最紧，每天的祷告、念经必不可少，到了一些特定的日子，小男孩还要去神父那里做忏悔。按照宗教的要求，他必须虔诚地信仰天主，做个有美德的好人，这个好人，这种美德，是拘谨的，简直可以说是战战兢兢的，它意味着等级、服从和无限的谦卑：在长辈面前，在神父面前，最终是在天主面前，都要低下头颅。

低下头颅的人，据说未来会得到永生。

弗朗索瓦相信他有这种特权，可是为了沐浴在天主的恩宠之下，就必须全盘接受宗教伦理的灌输。渐渐的，他发现自己成了一个自卑的人。他习惯性地多愁善感；他害怕的事情越来越多，当来到十五岁时，他在波尔多读高中，他来往的，都是一些跟他一样的、郁郁寡欢的天主教徒少年，从他们那里，他得知自己过几年要兵役，可能跟陌生人住一个寝室，他就好一阵惊慌。

宗教让人远离邪恶，越虔诚的人应该越接近完美的善。可是，弗朗索瓦的所见所闻却让他困惑。他的母亲，不仅严令佃农按时交租金，而且把佃农们的女儿都送去修院里做修女；她要求地区的小学教员都得信教，否则就不给饭碗；她对年轻人，不管是自家的还是别人家的，都是密切监视，有谁犯了什么道德过错或是说了犯忌的话，就要罚他们在教堂的角落里站着，甚至把他当瘟疫病人那样关禁闭。

弗朗索瓦有一个最大的困扰，那就是，他根本不敢正眼看女孩。再说，在那个寂寥空旷的乡间，他平时也只能看见零星走过的乡下女孩，她们畏畏缩缩的，面带惊恐，这些人就是他所了解的异性世界了。她们的人生，对标的是15世纪法国的民族英雄圣女贞德，可事实上，她们却常常成为暴徒的牺牲品。在乡间，有一些恶棍躲在密林的旁边，在溪流的深处，趁着夜幕降临袭击她们，而女孩被强暴了，都觉得是自己犯了罪，不敢吭声。

这些事情，母亲都知道，可她能做的只是祈祷，让邪恶远离自己的家庭和土地。她为孩子的成长而日渐紧张。当孩子提出一些所谓“不良”的问题时，她总是或者嘲弄，或者训斥。

弗朗索瓦有一次说起，附近某个寡妇喜欢上了一位少年，母亲一听这话就勃然大怒，她说：你这小的年纪，说这些事不害臊吗？

还有一次，母亲走进屋子，看见弗朗索瓦又在读小说和写东西了，就摇摇头说“你这可怜的人，你写的全是一堆废纸。”

看着家里的男孩子一个个长大，进入危险的年龄段，母亲是如临大敌：他们会变成怎样的男人？他们能抵抗自身的欲望，不去犯罪？于是，她千方百计，用家里的地产捆住孩子，用包办婚姻来缚他们，更希望能用信仰让他们一辈子安分守己。

弗朗索瓦把他的这些记忆，都写到了他的小说里。他在192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小说，故事里的典型人物，就是一个像鬼魅一样的母亲，她经常在夜幕降临时，手里端着蜡烛，静悄悄地上楼，下楼，偷偷地听儿女们在说些什么。

当然，这个女人并非完全等同于弗朗索瓦自己的妈妈，但却融入了他对外省童年生活的最阴暗的记忆。弗朗索瓦对母亲有这样几句概括：“她爱孩子，却对孩子不感兴趣。她感兴趣的是产业，还有那些她从来不讲出口的顾虑。”

母亲一直在暗暗地为孩子们计算他们所犯罪孽的轻与重，同时，她也一直在盘算，自己家的这份产业，要如何保存和安全地延续给后代。

但你有没有发现，她活在一个根本的自相矛盾之中？她一方面一心保住家产，让后代顺利接班，另一方面，随着年华老去，她又会愈来愈担心，子女是不是在暗暗盼着自己早死，好分她的财产。这是乡绅们普遍的心理状况，他们一个个活成了不折不扣的守财奴，身上燃烧着占有欲和控制欲。他们越是活得长寿，就越是性格古怪，面目狰狞。

弗朗索瓦在1932年发表的小说《蛇结》里，写了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地主，吐露出内心的所有恐慌和记忆，他说，在我们这里，每一个躺在病床上的有产者，周围都会徘徊着一群窃窃私语的家人近亲，包括儿子儿媳妇，女儿女婿，还有他自己的配偶。

他说，亲情是不存在的，存在的，只是围绕着遗嘱、遗产和土地的勾心斗角。

弗朗索瓦真心想离开这个家了。他心须离开乡下，去到城里。那么，省城波尔多如何？这个城市是远近闻名的美酒的故乡。可是，弗朗索瓦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见闻，描述了1900年初的波尔多的一个侧面。

那时，波尔多每年春秋两季，都举办一个大型的游园活动。弗朗索瓦在那里读高中时，会跟同学一起去，那里的空气中，飘着水果糖和炸土豆的气味。但是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，是一个木头房子，房子上面有五个洞，突然之间，就会有个女人把胳膊或大腿从洞里伸出来，吓人一跳，房子上挂着牌子，写着一个女人的小名，比如说“露露”。

在另一次的游园会上，他走进了一个博物馆，那里立着一些人体解剖的蜡像，还有蜡像展示女人分娩的——我们知道，这些展品并不是知识性的，而是带有警告性的，它用成人世界的隐秘，来吸引青春期少年，但又恐吓他们，就犹如色与戒的关系。

弗朗索瓦看到一个让他终生难忘的模型，它旁边的说明牌子上写：男人染上花柳病，它就溃烂发黑。

这个游园会，就是一百二十年前一个保守的天主教社会的文化缩影。

天主教说，有德行的人、虔诚的人死后才能上天堂，但用这一点来引人向善是不够的，因为人很难做到，为了久远未来的利益，而放弃眼前的享受，何况在人的一生中，他也难免要怀疑，这个天堂的许诺是否能够成真。所以，就要用上吓唬、恐吓的手段。游园会上会展出一些画，画中，先生太太们正在畅饮香槟酒，服务生在他们之间往来穿梭，一个个身穿制服，可是脸却是骷髅。这意思就是，贪图世俗享乐的人是要下地狱的。

少年弗朗索瓦忘不了这些东西。他先是被吓到，后来则是厌恶。他意识到，在这种压迫性的信息传达，这种粗暴生硬的道德教育背后，是一个庞大的同盟。财产、宗教以及道德风俗，都是他母亲的盟友，他们要他把男女关系视为罪恶，从而守身如玉，最终他将被安排一个门当户对的配偶，就此继承家业，终老于乡下。

好在弗朗索瓦还有书籍相伴。他读巴尔扎克的小说后，他发现，巴尔扎克是1850年去世的，但到了1900年，法国的乡下却没有任何的变化，那个守财奴葛朗台，就活在母亲的身上。

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松树林里处处都有生物在幽会，可在人类活动的空间里，却是念经，是忏悔，是各种冷言冷语，和对未来的忧心忡忡。十六岁，十七岁，十八岁，十九岁，弗朗索瓦说：一年又一年，我没有力量去死，我没有力量去生活。

到了二十一岁那年的一天，他对母亲交了底。

他说：我和你的利益并不一致；首先，我没有发誓要守身如玉，其次，我也不想因为多拥有一些土地而纳税。

这几句话出口，他的妈妈脸色大变，她觉得她遭到背叛了，之前苦苦栽培儿子的心血即将付之东流。

她慌张地问：“有人在煽动你，是谁？”弗朗索瓦回答：“我二十一岁了，我不需要被人问这样的问题。”

妈妈回到自己的卧室，推上了门闩。

要是在过去，弗朗索瓦会自己去敲门，在门边哀求说：“妈妈，给我开门吧。”

可是这次没有，他再也不会这么做了。

他决心离开母亲，却也知道，他的离开，就是对母亲的审判，为此他将永远心怀歉疚。他明白这里的悲剧，这里有一种爱，本该温暖人心，却转化成了干预和控制他人的力量；这里有一种道德，本该给予人以安宁，却扭曲成了让人自我压抑的力量。

外省乡村的格局只能如此，人无法超脱其外；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，自己和亲人，要想互爱，就会互害。

现在该结束了。

1907年，刚满二十二岁的弗朗索瓦·莫里亚克来到了巴黎读大学。他说，我这个口袋里没有介绍信的小小的外省人，开始征服首都了。母亲并没有强行挽留他，但对他做了最后一次努力，她说：到巴黎后，你必须只跟天主教徒住到一起。

年轻人摇摇头，说，他会勤奋学习，也不会放弃任何机会，我会遇见某些人的。妈妈问他：那么，你会为了善，还是为了恶？

他该怎么回答呢？面对这个虔诚而焦虑的母亲，他是该无情地出言伤害，还是应该嘴上敷衍一番，抚慰她呢？

弗朗索瓦没有告诉我们，他只知道，自己在一条漫长的隧道里走得太久了。

他去大学报到后，做的第一件事，不是来到教堂参加礼拜仪式，而是到了拉斯帕伊大街去找到一份工作：卖报纸。他卖的是《民主报》，叫卖的地点，是在大教堂的门口，当人们做完弥撒之后散场出来，就能听到他的叫卖声。

大城市，都是所谓的“花花世界”。

年轻人解放了，不再有人监视他，他可以随意地花钱而不必心生罪恶感。他可以坐到那些咖啡馆里，观察来来往往的人。有多少法国的小说家都是在起步的，可是面对同样的街头景观，不同的人却能看出完全不同的东西。

弗朗索瓦觉得，那些能够吸引他注意的女人，一个一个，依然都像是圣女贞德的模样。

家乡是无法摆脱的，家乡不仅是他的写作素材，而且是他道德的底色。当一些穷酸的妓女沿街走来，勾引他的时候，他说，我看到了邪恶。以前，我只是在精神上知道邪恶，听到人们惊恐地谈论邪恶，却看不见它，而现在我放眼看去，到处都有邪恶。在外省，邪恶是一些躲在暗处的畜生，会袭击那些没有抵抗力的孤身少女。在巴黎，这样的畜生不仅有，而且太多，以至于互相都能看到对方，于是每个畜生只能让凶相露在外边，同时设法掩住贪婪的嘴巴。

当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敲响，弗朗索瓦的耳边，却响起了外省乡间的鸡鸣。处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我，究竟属于哪里？女孩子一个个向我走来了，但是，女孩在跟我说过话之后，夸我说“你真是个天使。”

我不要听这句话：“你真是个天使”，那是在赞美我的怯懦、拘谨，赞美我在那条幽暗的人生隧道里漫长的煎熬。那隧道据说通往神圣的终点，我虽然已经逃了出来，可依然保持着天使的容貌，连翅膀都没有弄皱。

情欲的增长，和理智的发展，两种力量联合起来把他推到了家乡和天主的对立面。可是，弗朗索瓦说，一个人，如果越过了这道关口，还能相信天主是万能的、仁慈的，天主就是爱，这样的信仰才是虔诚的。

1952年冬天，当弗朗索瓦·莫里亚克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，他说了这样一些话：

人有善恶之分，我对善了解极少，对恶却深有体会，因为我熟悉世上的人。心地善良的人，襟怀坦白的人，是没有故事可写的。但那些草率的读者和批评家，却不曾注意过儿童在我的故事里的地位。我念念不忘罪恶，也就是念念不忘纯洁和童年。有个儿童在我所有的作品中间梦想。它们含有儿童的爱，含有最初的亲吻和最初的孤独。在我的作品中有毒蛇，也有鸽子在不止一章中筑窝。童年是我的作品中失去的乐园，它介绍了罪恶的秘密。

好了，今天的酒馆就营业到这里了，我们也要在夜色里送别弗朗索瓦，回到他的松树林中了。或许我们都会再想想，亲情对你我，到底意味着什么。

临别时，弗朗索瓦说：我爱那些阴险的人物，爱他们，正是因为他们丑恶，丑恶是一种不幸，我像一个母亲爱她最不幸的孩子一样，爱那些人。

我是云也退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

VISIT…

LANZAROTE Caliente.com